清代边疆开发史导论提纲

张晓虎

边疆开发史是中国历史学科中一支年轻的子学科。在中国古老而发达的历史学中，历朝都以不同的方式论及“筹边”问题，却又都是作为服务于奴隶或封建统治阶级的政治学（或称统治术）的一部份内容而见诸史册的。因此，它不仅带有明显的时代、阶级和民族的局限性，带有统治阶级的主观意志色彩，带有阶级压迫和民族歧视的性质，更掺杂着从错误立场出发而产生的诸多谬见，所以在学术研究方面也是非科学或反科学的。今天，我们在尽可能地占有较完备翔实的资料的基础上，尝试用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予以科学的分析说明，将边疆开发史纳入科学的轨道，一是为了建立起符合科学精神的边疆开发史研究学科，同时也是为今天中国广大边疆地区和众多少数民族的四化建设提供有益的历史参考和借鉴。

一、“边疆开发史”的科学定义及研究内容

边疆是人类历史活动的产物。边疆是随着表明私有制出现的国家而产生、并作为国家领土概念的重要组成部份而形成的地理区域概念，亦即对一个主权国家政治权限所及的地域范围的周边地理界定。一般地说，边疆包括边界线（由各种自然地理界定和人工设置的国界标识物连通的国界线）和边界线以内的各周边政区。因此，有国才有疆，国存则疆立，国灭则疆亡。

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中，由于“国”的概念与实际情况变化纷繁，因此“边疆”的概念和实际情况也随之不断变化。迄于今天，世界各国的边疆历史成因中，都包含着诸多合理或不合理的复杂因素，但尊重由于历史原因而积淀形成的边疆现状，并且客观地研究其形成的原因和历史过程，则是研究边疆开发史的必须前提和重要任务。

开发是人类对大自然能动地加以利用和改造的主要手段。因此，关于边疆开发史的研究内容，戴逸教授曾指出：“所谓‘开发’，即是人对环境的利用、改造。边疆有特定的自然环境和政治环境。自然环境指地形、气候、雨量、土质、动植物、矿藏等等，人利用这些资源谋求生存和发展，自然资源的或丰或啬，极大地影响人们的生产、生活和开发的速度。政治环境指当地的政局和秩序、战争还是和平？统一还是割据？和中原地区的联系是密切还是松散？有了稳定的政治环境才谈得到开发。中国是个大国，地区发展很不平衡，辽阔广大的边疆与海疆，包括东北、蒙古、新疆、西藏、滇桂以及台湾、海南，或为内陆、或为海岛，或属战乱，或属安定，情况千差万别。不同的自然环境和政治环境，决定了人们不同的活动方式，既有其共同性，也有其特殊性，认识和揭示人和环境的相互作用的规律是边疆开发史研究的重要任务。”

具体说来，边疆开发史的研究主要可从开发活动的目的、手段或方式、由此而产生的结果三个方面去进行考察：

1.开发活动的目的

人类在与大自然的斗争中求得自身的生存和发展，乃是任何地区、民族和时代的人类生产活动的最基本目的。我们所说的开发目的，是指人类进入文明时代之后，在不同性质的社会历史阶段所表现出的不尽相同的目的。中国自夏禹进入父权制的奴隶社会以后，遂萌始了“家天下”的有阶级社会之端。此后，往古时代的人类开发活动便从此被印上深深的阶级印痕，道家著作里描绘的那种“曩古之世，无君无臣，穿井而饮，耕田而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汎然不系，恢尔自得；不竞不营、无荣无辱。山无蹊径，泽无舟梁。川谷不通，则不相并兼；士众不聚，则不相攻伐……。势利不萌，祸乱不作；干戈不用，城池不设……。身无在公之役，家无输调之费，安土乐业，顺天分地，内足衣食之用，外无势利之争”①的原始共产主义图景遂不复存在。社会分裂为阶级，不同的势力集团又集结为国家，边疆作为国家领土的重要内容便随之产生。

在奴隶制高度发展的周王朝，曾大规模分封诸侯，即“封邦建国”，实质上是一种比较原始的部落殖民。相传武王、周公、成王先后建置七十一国，其中边远诸国即为边疆。这种分封的目的十分清楚，即“封建亲戚，以蕃屏周”。这时，“边疆”的概念并不仅指周王朝的周边地区，也包括各封国之间的界线，诸如分封鲁、卫时“疆以周索”；分封晋国时“疆以戎索”；分封申国时“彻申伯土疆”等等。可见，当时所谓“国”或“疆”的概念，只相当于现代“省”和“省界”的情况，与现代社会中“国”与“边疆”的概念不可同日而语。

在奴隶制时代，上古部落时“山无蹊径，泽无舟梁，川谷不通”的交通闭塞状况已完全被打破。而“身无在公之役，家无输调之费”更是发生了巨大变化，举国之民皆成为上至周天子、下至封国贵族的奴隶，井田制将奴隶们紧紧捆缚在奴隶制的生产方式之中。另一方面，国家又有可能组织起人数众多的治水或征战大军去从事各种活动，从而创造出灿烂的奴隶社会时代的文明。在整个奴隶制度的经济运行中，边疆作为“蕃屏”当然也被纳入轨道之中，与“内地”的政治、经济、文化产生千丝万缕的联系，相映生辉。但奴隶社会对边疆地区的征战或经济开发，其最终目的是攫取更多的奴隶和让这些奴隶“终于千亩”，即生产更多的粮食。这就使边疆开发活动在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受到奴隶制生产关系的限制，无法达到更高的水平。

封建社会之初，“废井田、开阡陌”等措施突破了旧有的生产关系格局，奴隶制时代的人身依附关系也得到改善，这同时深刻地影响到边疆地区。但在整个封建时代，各个朝代的封建统治者所形成的同心圆式的统治模式和施政方针，则造成了“边疆落后于内地”的总体特征。这并不否认各边疆地区也有某些优于内地长项，诸如蒙古的牧业、西北的商贸和手工业、西南的矿业、东南沿海的商业等等，但中国边疆又是众多少数民族聚居地区这一特殊情况，使得“天子守在四夷”始终成为封建统治者对待边疆地区的基本态度。一方面，随着内地封建经济的深入发展，边疆地区也随之共同进步，并且不断促进内地经济、文化等事业的繁荣；另一方面，边疆作为“蕃屏”，只要与内地相安无事，封建统治者也就心满意足。因此，各边疆地区的经济开发活动，虽然也构成中国各朝代经济活动的重要内容，成为不可缺少的一环，却又往往成为中原和内地经济的一种补充或附庸，这不仅在奴隶制时代，即在封建社会的漫长历史发展中也未能得到根本改观。

2.开发活动的手段或方式

3.开发活动的结果

关于 2 、 3 两题，可参见《清史研究通讯》一九八八年第三期《对清代边疆开发史中几个问题的认识》一文，此处限于篇幅不赘述。

二、清代边疆的形成与边疆开发问题的提出

起自康熙四十七年、历时十年之久始测定的《皇舆全览图》，奠定了超迈以往任何朝代的中国疆域版图。尽管它尚不及乾隆时的《乾隆内府舆图》更为细密完备，却是中国多民族国家统一大业已完成的里程碑。然而，清政府对各边疆地区的施政和开发措施，却早在此前的半个多世纪即已开始。

实际上，各边疆地区自古以来的开发活动从未停止过。无论是世居于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自身的开发活动，内地人口流向边疆后的开发活动或是历代中央政府组织的各种开发活动，虽然由于战争、灾荒、宗教等各种因素而受到阻遏，却总是时缓时疾地在进行着。然而以往任何朝代也未能像清王朝一样建立如此广大和稳定的疆域，更未能像清王朝一样卓有成效地解决众多少数民族问题，同时也不具备十七世纪以后西方资本主义崛起并且大规模东渐的世界环境，因此清王朝统治时、又尤其是鸦片战争以前的近两个世纪中，确实在边疆开发活动中取得了超越前代的成就。

清中央政府对各个边疆地区的开发措施，是随着武力征服之后的驻军派官等军事或行政建置措施而展开的。在鸦片战争之前，边疆开发的整个过程实则是内地高度发展的封建经济向边疆地区的扩大化，使得边疆与内地之间的相互影响和联系日趋紧密，改变了清代以前的松散状况。鸦片战争以后，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使各边疆地区首罹其难，出现了内外有识之士惊呼的“边疆危机”。从此，边疆与内地一样也产生了社会结构性变化，半封建、半殖民地成为整个中国的基本国情。

各边疆地区的开发又呈现出不同的势态。在东北地区，清入关之初为了保有这片“龙兴之地”而修浚边壕，建立“柳条边”。这种封禁政策的用意在于保住退身之地，但随着中原人口爆炸而出现的大批汉民出关北徙,“呼朋引类，日积日多”，标志封禁政策的柳条边形同虚设，东北地区遂成为移民开发的典型例证。黑龙江省的大规模开发，则是在康熙为抵抗沙俄侵略的戍边前提下展开的。鉴于自秦汉以来南北战乱不绝的历史，清政府对内外蒙古的政策始终置于民族问题之首，后来综理民族和对外事务的理藩院，其前身即蒙古衙门。清政府除了在内外蒙古设置层次细密的多级行政机构外，还采取了促进农牧业发展的一系列措施，诸如划分旗界、固定牧场、赈济灾荒、建立仓贮以及传授农耕技术等等。内地封建农业经济的大规模渗入，使蒙古地区长期的单一牧业经济格局被打破，在长城以北的西起鄂尔多斯、经归化城土默特旗、察哈尔、卓索图盟、昭乌达盟以至科尔沁东部的广大地区，形成汉人为主、蒙汉杂居的广大半农半牧经济区，成为蒙古牧业经济的有益互补。当然，由于当时科学知识的贫乏和垦殖政策的失控，大量流民盲目开垦所造成的草原沙化，则又形成流弊至今的历史遗害，是值得我们汲取教训的。新疆地区自平定准噶尔战争之后，同样以戍边为目的各种军事组织，全部转化成了农业生产单位，形成了特别是北疆地区蔚为大观的屯垦局面。包括兵屯、旗屯、回屯、遣屯、民屯等名目众多的屯田实边措施，开创了这一被外国史学家称之“人种最复杂”地区的封建农业新局面，从而形成清代边疆开发历史中颇具特点的重要内

容。对于西藏的开发措施，在乾隆执政时期达到了顶峰。在廓尔喀战争之后，清政府颁布了《钦定西藏章程》，对西藏旧有的经济制度进行了三方面的改革，一是铸币，二是加强西藏与国外贸易的管理，三是减免差税。然而，清政府对于地理环境和社会习俗都比较特殊的西藏地区，其统治政策的重心一直是求得该地区的稳定，而非积极地开发建设。因此，在鸦片战争前的两个半世纪中，清政府直接干预的经济措施不是很多，西藏地区的开发依然主要是旧有经济运动的延续，而且是走在元、明封建农奴制鼎盛时期的下坡路上。雍正年间推行对西南地区的改土归流政策，对于土司制度所造成的该地区分散、封禁状况是一种强制性的突破。诚然，伴随着改土归流政策的推行也有着血腥的杀戮，但此后封闭割据的局面被打破，更兼大量汉民的涌入，有力地改变了该地区的旧有落后的经济发展格局，这是清代以前所没有的。东南地区的边疆实则是一条广阔的海岸线，虽称之海疆，却又是历史以来"内地"的一部份，与陆疆上的几大周边地区的情况大不相同。能够与陆疆周边省份进行等量齐观的研究地区，则主要是台湾和海南两大岛屿省份。顺治十八年，郑成功收复台湾之前，当地的生产方式几近原始。郑成功及其后继者招徕移民、鼓励垦荒，兴修水利，使台湾经济发展迅猛，仅二十余年就呈繁荣之象。清政府统一台湾后，不但进一步发展了农业经济，而且商品经济空前活跃，使台湾经济水平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与台湾相比，海南地区的开发却大为逊色，但在清代也取得一定成效。从清初到十九世纪末，海南行政建置从一府二县发展到一省三府一直隶州四亍十一县，耕地面积从九万余亩激增至八百五十余万亩，人口从十万增至三百余万，经济状况得到很大改观。

上述极为粗略的勾述，远不足以概括清代边疆开发的丰富内容和诸多利弊，此处只想就清代边疆开发问题的提出作一简略回顾。可以看出，整个清代边疆开发的历史运动过程，总体来看是积极进步的，这主要表现为：

1.成功地完成了中国统一多民族的宏图大业，其重要标志就是解决了历时久远的边疆民族问题。清前期版图的奠定，使得各边疆地区的开发活动获得前所未有的统一性和有效程度，清政府对各周边地区的行政建置，不但体系完备，数量众多，而且其有效控制程度也是以前历代所难于比拟的。

2.有效地缩小了内地与边疆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势差。自古以来，无论"国"与"疆"的实际状况如何演变，边疆地区的经济总是处在相对落后于内地的状态上。迄于明清之际，无论陆疆或是海疆的台湾、海南各地区，大体上仍处在封闭状态下的本地区经济运行轨道上。而整个人类历史的发展经验表明，任何一个地区、民族或国家，无论它曾经创造过怎样辉煌灿烂的经济和文化，凡是长时期处于对外界新信息深拒固闭的社会或历史环境之中，都会引起自身肌体的必然衰竭。在清代，各边疆地区的封闭或半封闭状态被冲破，中原经济虽然走在封建农业经济的下坡路上（这并不否认康乾时期的一度经济复苏），但较之各周边地区的落后状况而言，却又不失为一种先进的经济模式。清王朝对边疆地区的统一和有效的控制，使得中原农耕经济获得向边疆地区发展扩散的有利条件，而中原人口爆炸的"压力"和边疆地区人少地广的"引力"，则使得中原数量众多的人口呈幅射状流向四面八方。除西藏腹地由于特殊地理环境外，几乎各边疆地区都在不同时期吸收了大量新信息的传播媒介——流民。流民的成份极为复杂，其中居多数的是农民，也包括市井百业的贫困者，还有少量由于各种原因遣成边疆的官吏和知识份子。这些人各以其所长在边疆开发活动中发挥着不同作用，不断深化了各边疆地区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封建化过程。

3.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嘉、道以后，又特别是鸦片战争以后，外国基督教势力随着武力扩张而向各周边地区的大规模渗透。总体上看，传教士们活跃在各边疆地区的目的是为殖民扩张服务的，但他们带去的各种西方知识新信息，使得边疆地区的人民群众（也包括少数爱国的官吏）在反抗外辱的同时，也受到强烈的震动，成为边疆开发活动中不同以往的一种外来新因素。这情况在各地区差异甚殊，只能审慎地去作具体分析。

4.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而各个边疆地区则首罹其难。长期以来，闭关封疆的状况发生巨变，“天朝帝国万世长存的迷信受到了致命的打击，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被打破了”②。随着资本——帝国主义列强的侵入，边疆危机日益加深，迫使封建统治者将防御重点转向各边疆门户。同时，围绕如何建设强固的边防，一大批具有爱国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诸如龚自珍、魏源、张穆、何秋涛、梁廷楠等人，相继以边疆问题为中心，写出一批高水平的学术著作。迄于晚清，中国边疆开发活动在侵略与反侵略的政治背景下，进入了空前活跃的阶段。

总之，清代中国的边疆开发史在鸦片战争前后则表现出不同的特色，空前的统一使前期显示出超越以往的新格局，外来势力的入侵则出现了以往没有的新因素，这都是历代边疆开发中所不具有的时代、社会和国际环境。

三、清代边疆开发的世界历史环境

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率先成功，不仅强烈地震撼了整个欧洲，也震撼了整个世界。大工业的兴起和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建立，使欧洲各国相继成为强国。但同时，西欧各国也争相开拓世界市场，将殖民的触角伸向各个角落，“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③当然，中国也不会被排斥在这股世界性的殖民灾难之外。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中国开始与外部世界发生越来越多的联系，而边疆开发也就具有了与以往任何时代都不同的意义。

从最早涉足中国的葡萄牙海盗商人（公元1519年）时起，荷兰、英国也继踵而至，东南海疆便成为国际斗争最繁杂的地区之一。在东北地区，沙俄政府的远征军大肆活动于黑龙江流域，引起后来发生的一系列武装冲突。同时，沙俄还多方染指北部和西北边疆，从十六世纪末开始，俄国的“外交使团”频繁出入我国厄鲁特蒙古各部，煽动民族纠纷，几乎终清之世不断。十八世纪七十年代，英国殖民主义势力插手西藏事务，大肆离间西藏与清政府之间的关系。凡此种种，都可见清代边疆的开发，始终是在多种外来势力入侵的国际背景下展开的，这就使得边疆开发的因素更为复杂。

首先，就开发的概念而言，无论是葡萄牙、荷兰、英国式的殖民侵略，沙俄对西伯利亚和中国北部（包括东北、蒙古和西北）地区扩张，还是稍后发生的美国著名的“西进运动”，在国外史学著作中往往一概名之为“征服”或“开发”。显然，这与我们所说的开发完全不可等量齐观，也是我们不能接受的概念。事实上，清代的边疆开发虽兼有抵御外辱、巩固国防的鲜明特征，而其主要内容却是以繁荣边疆为目的的经济活动，是同一主权国家之内的事务。在这一点上，无论国外史学著作中如何玩弄词藻，，我们在研究边疆开发史中必须明确两者之间的根本区别。

第二，清王朝是满族贵族集团建立的封建专制国家，其开发活动就必然具有时代和阶级

所特有的不合理性，诸如封建压迫和剥削、民族歧视和奴役、武力征伐和镇压边疆民族的正义斗争等等。但这种不合理性，与资本——帝国主义的世界性殖民和侵略也不是一回事。清王朝对边疆的治理开发是为了建立稳固强大的封建国家，而外国列强却是企图将全世界都纳入其殖民地的版图。

第三，在整个清代边疆的开发活动中，外国侵略势力几乎无时不在插手中国边疆事务，这使得清代边疆开发活动与整个世界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事务日趋紧密地发生联系，成为当时世界事务有机整体的一部份，这是清代以前所不具有的时代特点。尤其是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列强凭借坚船利炮将整个封建中国强行纳入西方资本主义经济的运行轨道，清代的边疆开发性质也发生了根本性转变，这是我们必须予以充分注意的。如果说鸦片战争之前的清代边疆开发活动，在总体上仍与西方处于背对背的历史竞争之中，那么鸦片战争之后，亡国灭种的危险则驱使中国的有识之士面对整个世界局势，晚清中国边疆问题研究者的大量出现，正是这一情况的反映。

综上所述，清代的边疆开发活动因国际形势的变化而增添了新内容，我们不能以封闭的眼光去看待这一问题，而应将其置于世界范围中去进行考察，才能使研究的主题更加广泛和深化。

另外，随着国际学术界对区域文化和区域经济研究的日趋重视，国外汉学家们几乎众口一词地将中国大部份陆疆地区称之为“亚洲腹地”。从历史地理学的角度讲，这种称谓似也无可厚非，即做为区域经济或区域文化去研究内外蒙古、新疆和西藏地区，亦无任何不可。然而，一些文章或专著假“亚洲腹地”学术研究之名，行否认这些地区自古即为中国领土之实，这却是我们无法接受的观点。因为仅从清代边疆开发的整个历史过程去看，任何人也无法得出上述地区游离于清代中国领土之外的结论。实际上，现今任何拥有较多民族的国度，在其历史中都会形成多姿多彩的众多区域特征。这些不同的经济和文化区域，既保存着相对独立性（也有一些出现合并、同化乃至消亡），更多地都是在复杂的相互作用中走向共同进步。迄于今日，历史的发展已使世界各民族、地区和国家日益紧密地纽结在一起，“首先是全局，其次才是局部”，此乃历史发展的趋同性和必然性。因此，对“亚洲腹地”出于学术研究之外的任何考虑，我们均认为是欠妥的。

---

①、《抱朴子·诘鲍》。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2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255页。